

论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隐者形象

田云明

(唐山学院 外语系,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论语》《庄子》《史记》《后汉书》《晋书》《世说新语》等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众多隐者形象,文章通过对这些古代典籍中隐者形象的梳理,归纳出拒官不仕型、佯狂型、归隐田园型、投身“无用”型四种隐者形象的类型特征,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中国古代典籍;隐者形象;隐者文学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9)02-0058-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9.02.009

On the Images of Hermit i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TIAN Yun-m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angshan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numerous images of hermit i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such as *Analects of Confucius*, *Zhuangzi*, *Historical Records*, *History of Latter Han*, *Book of Jin*, *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the images of hermit in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four types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respectively: those who refuse to take the official post, those who feign insanity, those who live in seclusion and those who are devoted into literature and arts.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images of hermit; literature of hermit

隐逸是与出仕相对的概念,本是乱世的产物,其根本思想是逃避政治、保全自身。随着时代的变迁,隐逸的含义也从脱政治、反官场的本义,扩大到摆脱社会秩序的束缚和世俗的烦累。中国自古每逢王朝交替,便会出现积极置身体制外的隐逸之士。殷商革命之时,“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的伯夷、叔齐;政治黑暗的魏末晋初,“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说新语·任诞篇》)的竹林七贤;战乱频繁的东晋末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陶渊明等,均为隐

逸的代表人物。隐逸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儒家式隐逸,另一类是老庄式隐逸。正如霍建波所归纳的,“儒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是手段式的待时之隐,它因为具有实际的操作性而成为后世不得志文人现实的行动指南,而道家发扬的则是目的性的适性之隐,它虽然实际上难以达到,却是隐逸境界的最高理想,成为身心疲惫的文人们的永远期待”^{[1]53-54}。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隐逸者的称谓多种多样,如隐者、逸民、处士、隐士等,虽然在含义上略有差别,但基本属同义,均指避世隐居之人。

基金项目:201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ZH091)

作者简介:田云明(1979—),女,河北唐山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其中隐者、逸民等词很早便在《论语》中出现。《论语》可谓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较集中地记录隐者言行的作品^[2]。自此,有关避世隐居之人的言行不断被中国古代的史书、笔记小说、文学传记所记载和传颂,其人物形象也不断丰富,其人物特征也更加鲜明。为研究之便,本文将此类具有隐逸言行特质的人物形象统称为隐者形象。《论语·微子篇》集中记录的楚狂接舆、荷蓑丈人、伯夷、叔齐等人的言行,可谓中国古代隐者形象的原型。本文将以《论语·微子篇》为线索,结合《庄子》《史记》《后汉书》《晋书》《世说新语》等古代典籍,简略梳理一下中国古代隐者形象的类型特征。

一、拒官不仕型隐者形象

《周易》可谓是中国隐逸传统之源,开启了儒、道隐逸思想的端绪^{[1]37-42}。其中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蛊》)、“天地闭,贤人隐”(《周易·坤》)等言论,阐明了隐逸行为最基本的含义。上古时代的巢父与许由,可谓“不事王侯”的先达。据《艺文类聚》卷三十六《隐逸上》引嵇康《高士传》所载:

巢父,尧时隐人,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人号为巢父。尧之让许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隐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击其膺而下之。许由怅然不自得,乃遇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乡者闻言,负吾友。”遂去,终身不相见。

与许由洗耳的典故相关联的,还有许由辞让天下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例如《庄子·逍遥游》中的描绘: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燔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尧让天下于许由,而许由不受。正如“名者

实之宾”所言,许由追求的并非名利,而是各得其所的安分与自足,因此,面前虽有执掌天下的诱惑,却不为之所动,断然拒绝。同样辞让天下的,还有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齐。《论语·微子篇》在列举“逸民”时曾提及二人,并得到孔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赞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甚至把《伯夷列传》作为人物列传的首篇,对二人的义举记录如下: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中略)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巢父、许由、伯夷、叔齐作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典型代表,其高尚言行得到了后世的颂扬与效仿,因此,历代中国正史的隐逸传中涌现了大量高尚不仕、称疾不就的隐者形象。《后汉书·逸民列传》所收周党传中记录,对于博士范升诋毁周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等对皇帝的“大不敬”行为,皇帝下诏曰:

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

皇帝对于周党的守节不仕非但没有怪罪,反而将其纳入伯夷、叔齐之列,加以称颂、褒奖。范曄在《后汉书·逸民列传》所收《高凤传论》中引其父范泰语云:

古者隐逸,其风尚矣。颍阳洗耳,耻闻禅让;孤竹长饥,羞食周粟。或高栖以违行,或疾物以矫情,虽轨迹异区,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且犹不显,况怨累之为哉!

可见许由洗耳、夷齐采薇已是民众熟知的典故,隐逸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上述对于隐者身晦而志显的高贵品质的评论,也成为古人评价隐逸的通识。

纵观《后汉书》《晋书》等历代中国正史的隐

逸传,出现频率最高的便是“不就”一词,以及与之类似的“不听”“称疾不就”“高尚不仕”等表现。“不就”是隐逸相对于出仕最核心的要素,拒官不仕型隐者主要通过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及言行表达对执政者或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抗与批判。拒官不仕型隐者形象的形成,其源流始于《周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等对隐逸的最初阐释,并通过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隐者形象得以巩固和发扬光大。可以说,拒官不仕型隐者形象是众多隐者形象中最基本的类型,其标志性行为核心“不就”是其他各类隐者形象的共通要素。

二、佯狂型隐者形象^[3]

在《论语·微子篇》中登场的楚狂接舆,可谓中国古代佯狂型隐者形象的鼻祖。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楚国的狂人接舆一面从孔子车前走过,一面唱道:“现今的执政者是危险的。”接舆的“狂”,并非真狂,而是为了不为官、不从政故意摆出的一种姿态,即“佯狂”。同时也是身处乱世的处世之道。孔子欲下车与其交谈,反映了孔子对狂者一定程度的认可。同样,在《论语·微子篇》开篇,还提及了另一位狂者箕子。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比干忠心谏劝,却惨遭暴君纣王迫害而死;微子审时度势,断然离去;而箕子忠谏,纣王不听,只得佯狂为奴,终保一命。孔子将微子、箕子、比干并称为“三仁”,可见其对箕子佯狂行为的敬仰与赞誉。有关《论语》中的接舆、箕子等佯狂型隐者形象的先驱人物,东方朔在《非有先生论》中归纳如下:

接舆避世,箕子被发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文选》卷五十一·东方朔《非有先生论》)

在此,东方朔将“佯狂”的目的归纳为“避浊世”“全其身”。“避世”具体而言,即不为官,不

从政。《史记》《后汉书》中,与“佯狂”“狂生”等用例并用的“不肯立”“不就”等表现,充分表明“佯狂”已成为拒绝为官的惯用手段。这也恰恰体现了隐逸脱政治、反官场的本义。

玄成时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让国之名。《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

统性傲倪,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到了政治动荡的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可谓佯狂型隐者形象的又一典型。《世说新语·任诞篇》的开篇,对竹林七贤名称的由来有如下记述: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例如,《任诞篇》中记录了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对抗同族的一则奇行。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可见,竹林七贤的佯狂,是对世俗礼法的强烈反抗,也是生逢乱世保全自身的无奈之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七贤,其异于常人的言行可看作是隐逸概念外延的扩大。

通过对中国古代典籍中佯狂型隐者形象的考察,可见佯狂原本是用来形容接舆、箕子等隐者的固定表现。佯狂,其行为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避世,即拒绝为官的佯狂;其二是全身,即免遭杀身之祸的佯狂。随着隐逸内涵的扩大,佯狂奇行也成为反抗世俗礼法的一种方式。而且,后人及记录者对佯狂型隐者形象的态度多是敬仰的,对其佯狂行为是称颂的。

三、归隐田园型隐者形象

作为归隐田园型隐者形象在《论语·微子篇》中首先登场的是躬耕田园的长沮、桀溺。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

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桀溺以“辟人之士”“辟世之士”，一语道破与孔子的区别，且“耒而不辍”，言行中充满了对孔子师徒的轻蔑与不满。而孔子始终恪守“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的原则，以“天下有道”为由，不与之伍。《论语·微子篇》中，还出现了另一位归隐田园型隐者——荷蓑丈人。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士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执杖锄草的老农斥责子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孔子非但没有恼怒，反而称其为“隐者”，并派子路再次拜会荷蓑丈人，未果。可见孔子对隐者并不排斥，甚至想要主动与之交流，反映了孔子对隐者一定程度的尊重和认同。

继《论语》中登场的长沮、桀溺、荷蓑丈人等躬耕田园的隐者，东晋末年又出现了归隐田园的陶渊明。据《宋书·隐逸列传》记载：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秬，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秬。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

短短百余文字，屡次出现“不堪吏职”“自解归”“不就”“解印绶去职”等辞官、拒仕的语句。事实上，陶渊明曾五次出仕，又五次归隐，最终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去彭泽令，走上了躬耕田园之路。然而，归隐田园并非都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还要面对贫穷、饥寒等现实生活的困苦。可陶渊明却从未后悔，不改初衷，并借前贤抒发自己对躬耕田园的由衷热爱：“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出自陶渊明《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在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等隐逸诗中，还曾多次提到荷蓑丈人，可见陶渊明也将自身视为长沮、桀溺、荷蓑丈人等归隐田园型隐者的后继者。在其生前绝笔《自祭文》中，对归隐田园的一生曾有如下追忆：

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簞瓢屡罄，絺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国，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

物质生活的艰难并没有压垮陶渊明，他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自足与安乐。正如萧统《陶渊明集序》中赞叹道：“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4]陶渊明田园闲居的隐者形象及其田园诗对后世的隐逸行为、隐逸文学等影响深远，他可谓是归隐田园型隐者形象的典型代表。

四、投身“无用”型隐者形象

《庄子·人间世》篇末明确提出了“无用之用”的说法，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因其材其能，山木、膏火遭受了“自寇”“自煎”；因可食可用，桂、漆被伐、被割。世人眼中的“有用之用”，却将它们推向了危险的境地，即所谓“材之患”。有关“无用之用”的具体讨论，可见于《庄子》的《逍遥游》《人间世》《山木》诸篇。例如，《庄子·逍遥游》中有如下寓言：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

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蘧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从世俗的功利性视角来评价,惠子的大树的确不材、无用,然而,从庄子的超世俗、非功利性视角来看,大而无用的大树却能使人的心灵逍遥世外。庄子之所以提出“无用之用”,就是在政治与世俗之外追问生命的可能价值^[5]。这也是历代隐者所要思索的共同问题。相对于政治与世俗的“无用”究竟是什么?《庄子·让王》中似乎早已蕴含了答案:

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

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衲粥;郭内之田四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

颜回为摆脱出仕功名利禄的烦累、患得患失的纷扰,坚持躬耕田园,生活上自给自足,弹琴修身,精神上自娱自乐。其中,“鼓琴”从政治和世俗的角度来看是“无用”的,然而对于隐者而言却“足以自娱”,体现了其“无用之用”。纵观历代隐逸传,众多隐者都选择以琴为伴。

居有顷,妻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鸿曰:“诺。”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后汉书·逸民列传》梁鸿传)

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晋书·隐逸列传》孙登传)

戴逵字安道,谯国人也。少博学,好谈论,

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文而自镌之,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叹。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晋书·隐逸列传》戴逵传)

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宋书·隐逸列传》陶潜传)

上述投身“无用”的隐者中,不乏艺术家的身影。例如,孙登不仅会弹一弦琴,而且尤善长箫,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都曾求教于他。而东晋的戴逵博学多才,不仅善鼓琴,更是著名的美术家、雕塑家。其中较为特别的当属陶渊明,虽不解音律,却备无弦琴常伴左右,酒到酣时甚至拨弄把玩,旨在“以寄其意”,亦即“弹琴以自娱”“常以琴书自娱”中的“自娱”。这一方面显示了陶渊明的雅趣,另一方面也表明琴已经成为隐者的一个标志性符号。难怪历代隐者纷纷效仿,嵇康甚至作名篇《琴赋》,从艺术论的高度对琴的美学境界进行了深入阐释^[6]。而嵇康的另一首《琴赞》则是其观点的诗意表现:

昔在黄、农,神物以臻。穆穆重华,五弦始兴。闲邪纳正,感物悟灵。宣和养气,介乃遐龄。惟彼雅器,载璞灵山。体具德真,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温乎其仁,玉润外鲜。

寥寥数行,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琴“清和自然”的高雅品格,以及令人修身养性、返璞归真的功能。这些都与“高尚其事”“越名教而任自然”等隐者的气质高度吻合,也成为隐者爱琴的重要原因。

正如《晋书·隐逸列传》戴逵传中“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所述,历代隐者所投身的“无用”不仅限于琴所代表的音乐,还涉及诗文、书法、绘画等领域。简言之,相对于政治与世俗的“无用”,即文学与艺术。投身“无用”型隐者为了摆脱政治束缚、超越世俗名利,反其道而行之,主要通过全心致力于文学艺术创作来净化心灵、陶冶情操,以实现精神世界的自足、自娱、自乐。

五、结语

以上,通过对中国古代典籍中隐者形象的考察,简要归纳出拒官不仕型隐者形象、佯狂型隐者形象、归隐田园型隐者形象、投身“无用”型隐者形象的类型特征。其中,拒官不仕是隐者形象的核心特征和共通要素,而佯狂、归隐田园、投身“无用”则是实现拒官不仕、达到超越世俗的不同手段和途径,实则殊途同归。因此,拒官不仕型隐者形象是众多隐者形象中最基本的类型,而其他三种隐者形象则是因隐者所处时代背景及个体特性差异而出现的不同表现类型。当然,上述四种隐者形象,在很多情况下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同一隐者甚至兼具两种乃至多种隐者形象的特征。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隐者形象,堪称中国古代隐者形象的典范,不断为后世记录和传颂,对中国的隐逸思想、隐逸文学的形成以及传记文学中理想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 [1] 霍建波. 宋前隐逸诗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 马晨雪.《论语》中的隐士形象[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28(10):30-34.
- [3] 田云明. 中国古代“狂僧”形象的东渐——以智藏传、增贺传为例[J]. 外国文学评论,2018(2):27-28.
- [4] 陶渊明. 陶渊明集[M]. 逯钦立,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9:10.
- [5] 王玉彬. “无用”与“游世”——庄子哲学中的生存方式之论析[J]. 哲学研究,2014(4):63.
- [6] 邱玥. 嵇康艺术论的人文哲学美学意境[J]. 求索,2012(9):154-156.

(责任编辑:李秀荣)